

■ 历史真相的泥淖

历史真相的泥淖

[克]弗拉尼奥·图季曼 著
达 洲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二、关于克罗地亚具有种族灭绝本性的理论没有根据

许多有知识的人是没有头脑的。

——德谟克利特(公元前 460—370)

命运赐给我们恩惠,让我们出生,并在一个欺骗我们的时代生活。

——佩塔尔·塞格丁

3. 从神话到理论

对于灵魂野蛮的人,眼睛和耳朵是恶罪的见证人。

——赫拉克利特(公元前 535—475)

我们探讨了亚塞诺瓦茨问题争论的起源之后,现在应当转而谈谈从形形色色的歪曲和谎言中必然产生的一系列后果的总

的情况,而这些歪曲和谎言的顶峰是关于克罗地亚具有种族灭绝的本性的想法。

这些想法经常存在,甚至在游击队运动的队伍中也是如此。我已经提到过塞尔维亚的战士对克罗地亚革命者显示出不信任。我已经提到过在战时和战争结束时有必要阻止对克罗地亚村庄和克罗地亚人民的报复。同样,战后不久,对乌斯塔沙分子的罪行的夸大导致了公众要求对被俘的民防军实行报复。

6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关于克罗地亚人民要对〔南斯拉夫〕王朝的覆灭负有历史罪责的看法又开始重新抬头。特尔齐奇在他上述1963年问世的著作中,以最激烈的形式提出了这种看法。这部著作所论述的,简而言之,就是克罗地亚领导人从20年代的联邦主义纲领转变为奉行分立主义,把克罗地亚问题提交国际公众,削弱了“国家的团结和抵抗力”,实际上代表克罗地亚全体人民的马切克的克罗地亚农民党领导犯下了“我们几代人永远要予谴责”的“滔天大罪”,而王室国家的衰落要归咎于整个克罗地亚民族。

特尔齐奇的书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克罗地亚民族对南斯拉夫王国的崩溃和战时遭受的一切苦难负有历史罪责的神话。这一神话并没有为官方所接受,但是仍然牢牢地保持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并且有新的特点。最后,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克罗地亚民族成了要对这个国家出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负责的主要罪犯。

特尔齐奇1983年出版了《南斯拉夫王国1941年的垮台》一书,这本书实际上是他写于60年代的那本书的修订本。他在这本新书中追述了他原先的一些结论,作了说明,并补充了新的内容。鉴于米洛·格利戈里耶维奇提醒他,武克·维纳韦尔的看法是“亚塞诺瓦茨是王朝覆灭的第一个后果”,特尔齐奇的看法

是,在种族灭绝问题上,“有人害怕真相”,或者“回避真相,回避现实”。据特尔齐奇说,真相是,“在亚塞诺瓦茨之前,克罗地亚有漫长的教权主义历史,从安特·斯塔尔切维奇到安特·帕韦利奇至少灌输了50年;在历史的连续性中,仔细地推进一个反塞尔维亚人和反塞尔维亚民族的始终如一的政治理论”。

特尔齐奇从来不考虑问一下为什么“在塞尔维亚、黑山、斯洛文尼亚,甚至达尔马提亚的一些地区,侵略者受到的接待是十分冷淡的,对立的和怀着仇恨的。然而,在克罗地亚北部的某些地区,在波斯尼亚居住着天主教徒和穆斯林的许多地区,在马其顿东部的某些地区以及在主要居住着少数民族的一些地区〔科索沃、巴纳特和巴奇卡〕,人们把侵略者当成解放者,报以热情和欢乐,甚至给以特殊的荣誉”。这样一些事实并没有促使他比较深入地考虑这个问题;相反,他只是简单地“对侵略者的这种热情”归之为“国内外敌人联合起来所作的努力”,归之为“国际上反对南斯拉夫的阴谋”。

特尔齐奇如果对斯塔尔切维奇这样一位伟大的克罗地亚思想家给予他应受到的体谅的一部分的话,他就有可能至少发现对上述问题的部分回答。这就是说,他本来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一个已经到了没有什么可以维护和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地步的民族”是不会为了它的敌人,也不会为了它并不认为是自己国家的国家“去作出什么牺牲”的。“一个被压迫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它的压迫者的朋友的”,“从来没有人发现,要统一或者维护一个非法的国家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维护反对本应成为它的公民的那些人的意愿的国家……”。斯塔尔切维奇是在100多年前谈到“始终不变的奥地利”时说这番话的,因为“独裁制度不会改善,而只会垮台”。他当时告诫维也纳的霸权主义者;对于从反对克罗地亚民族的“非法行动中可能产生的后果,我们拒绝

承担任何责任”，克罗地亚民族希望“摆脱任何桎梏”，而不仅仅是“改变桎梏”。因为“克罗地亚民族需要和希望成为自由和幸福的民族，它有这个权利，就如其他任何民族有这个权利一样”。^①

特尔齐奇自认为有权从违背克罗地亚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对克罗地亚的历史作出结论和判断。大概他会发现斯塔尔切维奇十分可憎，后者正是议论过这样一种立场：“不愿意承认一个民族最清楚什么对它真正有利。如果这个民族之外的某个人声称他有这样的知识，那就意味着盲目地承担起审慎的统治者避免承担的那种巨大责任，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嘲弄……声称这种权利可以改变是愚蠢的和危险的……没有一种谬论比这种看法更缺乏根据，或者没有一种信条比这更有害。”

斯塔尔切维奇把“每一个人的民族性视为最神圣的事情”。他公开说：“我们只是在对克罗地亚有用的情况下才关心奥地利好的或者坏的前途。”他下面的讲话同样是意义重大的：“克罗地亚民族将以其他民族尊重克罗地亚人的自由的同样方式尊重每一个民族的自由。”当有人谈到斯塔尔切维奇是克罗地亚现代民族觉悟的奠基人时，这是指不能忘记他对塞尔维亚主义的否定。然而，从历史的角度不允许片面评判这一点，因为历史事实是，斯塔尔切维奇拒绝塞尔维亚统治，是为了维护克罗地亚属性，反对武克·卡拉季奇及其追随者，后者靠他写的《所有的和到处的塞尔维亚人》一文（以及他后来写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建立了现代的大塞尔维亚意识形态，否定克罗地亚人的历

① 参看安特·斯塔尔切维奇：《著作》（萨格勒布 1893 年版）、《选集》（萨格勒布 1943 年版）以及《思想和观点》（萨格勒布 1971 年版）的有关部分。

史、名称和未来。^①

卡拉季奇写道：“如果〔克罗地亚人〕不希望被称做塞尔维亚人，他们就没有民族名称。”斯塔尔切维奇猛烈地抨击克罗地亚的“斯拉夫塞尔维亚人”（亲斯拉夫主义和洛斯拉夫主义的克罗地亚人），针对的是那些准备同化克罗地亚属性，把它并入南斯拉夫主义思想以及准备效劳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政治家。斯塔尔切维奇拒绝塞尔维亚主义，恰如武克·卡拉季奇拒绝克罗地亚属性一样。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他以肯定的口吻写文章谈到“塞尔维亚公国”。他否定地谈到的只是那些生活在克罗地亚，却反对克罗地亚利益的塞尔维亚人。斯塔尔切维奇的看法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从时代精神看，是民主的。这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得出结论：这些看法对克罗地亚的知识分子有重大的影响。他的思想为一大批东正教基督徒所接受，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斯塔尔切维奇的权利党的著名追随者。像特尔齐奇所做的那样，把斯塔尔切维奇同亚塞诺瓦茨遇难者联系在一起，是一个迹象，表明要么是对历史的无知，要么是对克罗地亚民族特性的否定，斯塔尔切维奇对这种民族特性的看法在上个世纪表现得最为突出。

1986年秋天，瓦西利耶·克雷斯基奇在贝尔格莱德《文学报》上发表了文章《谈谈克罗地亚独立国对塞尔维亚人种族灭绝的根源》。在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不和的根源史上，克雷斯基奇的文章所占的位置大概仅次于尼古拉·斯托亚诺维奇的论点：“直到你们被消灭，要么我们被消灭。”

① 这篇文章据说写于1836年，发表于1849年的下面这本书中：《武克·斯特凡诺维奇·卡拉季奇谈三种信念的塞尔维亚人的历史、语言和风俗的宝库》，维也纳1849年版。

克雷斯蒂奇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们社会的广大阶层对种族灭绝问题有强烈兴趣”。维克托·诺瓦克的《滔天大罪》的重新印刷以及米莱蒂奇关于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材料汇编的问世，斯塔诺耶维奇关于斯特皮纳茨的书，关于对阿尔图科维奇审讯的书的问世，唤醒了这种兴趣。鉴于岁月“不仅没有使战争的恐怖，特别是那些夺走塞尔维亚人生命的人从我们的记忆中消退”，而是“使这些恐怖的情景复活”，克雷斯蒂奇着手回答“无法抗拒的”问题：“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为什么要发生？”这个问题“事至今日仍未得到回答”这一事实，以及围绕《滔天大罪》一书的争论“表明：对诸如有关乌斯塔沙分子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对塞尔维亚人实行种族灭绝等微妙问题，有必要展开严格客观的学术讨论”。这无疑是正确的态度。这也是他在前言中讲的话，即只有研究“延绵了几个世纪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关系史，才有可能找到答复。然而，作者只探究克罗地亚人反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灭绝意图，而不探究塞尔维亚人反对克罗地亚人的种族灭绝意图。

瓦萨·博格丹诺夫从1957年至1964年发表了五部著作，探讨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冲突的历史，但是他的观点根本没有打动克雷斯蒂奇。这五部著作阐述了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冲突的历史原因，直到今天，这还是最详尽的论述。令人奇怪的是，克雷斯蒂奇不考虑这些著作，尤其令人奇怪的是，它们的作者是身为塞尔维亚族的南斯拉夫和克罗地亚历史学家。更不寻常的是，克雷斯蒂奇居然认为发表在《表现》杂志上的博格丹诺夫的文章（《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误解之初》）“仅仅提出了这个问题”，尽管克雷斯蒂奇完全知道，博格丹诺夫战后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克雷斯蒂奇应当知道博格丹诺夫完善他的论点的一些作品。据克雷斯蒂奇说，博格丹诺夫“完全依据

安特·斯塔尔切维奇有偏见的看法,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些看法”。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说法。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提到博格丹诺夫的任何其他看法,不然读者可以自行作出确切判断。

克雷斯蒂奇认为维克托·诺瓦克的《滔天大罪》一书是这一类书中“第一部和最杰出的”一部,这并不令人奇怪。他感到遗憾的只是,“在透露有关乌斯塔沙分子的克罗地亚独立国种族灭绝的原因真相方面,这是独一无二的突破”。克雷斯蒂奇写道:“肯定的一点是,克罗地亚发生的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灭绝行为的根源,必须到所谓的东正教基督徒弗拉赫人,即塞尔维亚人在土耳其人压力下在16至17世纪开始在克罗地亚人的土地上定居的时代去寻找。”

这一说法仅仅在解释冲突的开始这一点上是有根据的。然而,它把东正教弗拉赫人同塞尔维亚人等同起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种族起源或者从民族意识上来说,肯定还不是塞尔维亚人。不仅是克罗地亚人,而且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甚至包括塞尔维亚人自己在向所有的罗马人、罗马化的伊利里亚人和巴尔干的色雷斯人,提到自己时都称自己为弗拉赫人。在南部斯拉夫人中,只有一部分是种族意义上的塞尔维亚人,随着把东正教与塞尔维亚属性视为同一,其他人才被视为塞尔维亚人。这种做法开始于维也纳在克拉伊纳^①赋予东正教基督徒以特权之时,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

弗拉赫人获得自由民地位之后,不仅打乱了封建秩序,而且

^① 克罗地亚西部濒临亚得里亚海,与波黑交界的塞尔维亚族聚居区。——译者

他们还赞成军事边区^①脱离克罗地亚议会和巴昂〔总督〕的控制。弗拉赫人被用来侵犯克罗地亚当局的主权,并得到援助来肢解克罗地亚的土地并使之实行军事化,从而加强了维也纳对受到军事边区削弱的〔克罗地亚〕巴昂政府的中央控制。在克拉伊纳建立双重政权和实行非军事化后,对弗拉赫人的反感就更为增加,特别是由于信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与匈牙利奉行的霸权主义政治相勾结,削弱克罗地亚的自治权。与此相联系,不要忘记塞尔维亚政治家有一段时间与亲意大利的人一起反对克罗地亚的达尔马提亚与由巴昂统治的克罗地亚其他地区统一,更不用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了。因此,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很难推断为一种“克拉伊纳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封建领主间的”阶级“对抗”。

克雷斯蒂奇说,在17世纪和18世纪,“克罗地亚的封建集团……准备对在特定条件下违背他们的意愿,定居在他们的领地上,侵犯他们作为封建领主的权利的塞尔维亚信东正教的居民准备实行种族灭绝”,他这么说并无可靠的根据。但是,他把这一点归之于据说“是以宗教上的排他主义而出名的克罗地亚上层阶级”,这就错了。1608年,克罗地亚议会曾通过一项决定,根据这项决定,只有信天主教的人的公众权利才得到承认,这为上述说法没有提供任何依据。这项决定主要不是针对东正教的,但通过这项决定是为了保护克罗地亚的主权,因为通过在克罗地亚地区传播新教,军事边区当局试图削弱克罗地亚的统一和加强维也纳的中央集权制。克雷斯蒂奇从来没有想到要提

① “军事边区”系奥匈帝国16世纪中叶在它占领的克罗地亚各地设立的行政—军事建制,目的在于对付相邻的奥斯曼帝国。——译者

一下穆斯林在塞尔维亚领土上遭屠杀的事。无疑,此事不是种族灭绝,而是一个值得在最壮丽的“塞尔维亚史诗”《山上花环》中颂扬的事业,这部史诗是最伟大的诗歌作品和最崇高的道德指南。

克雷斯蒂奇关于克罗地亚属性中具有种族灭绝倾向的整个理论的中心论点,是否认存在一个克罗地亚的“政治”民族。克雷斯蒂奇认为,在整个资产阶级发展时期,“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政治领导人之间以及广大民众阶层中间的”不和,来源于“克罗地亚的民族—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完全以存在一个政治民族或者外交民族的思想为基础的”。正是这一思想使“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人很难克服观点上的分歧”。因此,“产生了激烈的相互对抗,使不容异说的情绪上升,而这在克罗地亚某些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人士中又逐步地发展为更为明显的种族灭绝情绪”。可惜,令我们感到纳闷的是,在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在塞尔维亚人士中就没有出现任何类似的现象呢?

克雷斯蒂奇争辩说,“克罗地亚民族”这个概念“来自匈牙利国家—封建政治意识形态”。这样一来,克雷斯蒂奇就为对一切历史事件进行新的政治和国际的合法解释奠定了基础。在克雷斯蒂奇看来,克罗地亚所有市民政党的纲领的根本基础,是克罗地亚的国家和历史的权利,因为克罗地亚“保持着半封建的性质”。

克罗地亚人不是从匈牙利人的国家—封建意识形态中获得民族生存思想的。事实上,克罗地亚人利用这一思想反对通过消灭克罗地亚提高匈牙利地位的意识形态。确切地说,正是由于克罗地亚人对自己历史权利和国家权利具有无法消灭的活生生的意识,他们才抵制了布达佩斯、维也纳以及后来贝尔格莱德的霸权主义的侵犯和同化企图。这一思想的根源可以从中世纪

时的克罗地亚国家中找到,而不应到别的什么地方寻找。中世纪时的克罗地亚国家受到克罗地亚贵族的维护,后来又受到死于战场和地牢的封建领主的维护,它是克罗地亚一切市民政党纲领的“根本基础”,这不只是“直到 20 世纪开始的时候”,时间还要早。正是这一思想(还加上自然权利各项原则)使拉迪奇的党成了全民族运动的代表。这一思想是反对帕韦利奇的克罗地亚独立国的。这一思想包含在克罗地亚 44 名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令人深为感动的遗言中,他们于 1941 年,在迎接死亡的道路,在一面墙上刻下了他们对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克罗地亚的誓言。

据克雷斯蒂奇说,“反动的”克罗地亚封建贵族根本没有历史权利来坚持建立克罗地亚政治民族。从社会角度看具有进步意义的弗拉赫居民群体一出现,克罗地亚人就应当投降。我们要问问他,根据同一逻辑,在信东正教的弗拉赫人到来之前,克罗地亚的“世俗领主和封建领主”是否应当放弃他们的克罗地亚权利,拱手交给一再出现的弗兰克和拜占庭、威尼斯和奥斯曼、匈牙利和德国的屠夫和侵犯克罗地亚土地的入侵者呢?自然,克罗地亚的贵族不可能、不应当、也不想“满足”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要求。

克雷斯蒂奇攻击克罗地亚议会在伊万·马祖拉尼奇巴昂统治时期合法地通过的教育制度,因为他致力于“克罗地亚化”。如果从历史上找到一个事例,表明一个民族的享有主权的政府不致力于民族的同质化,那会是令人感兴趣的。为什么要单单把克罗地亚作出的这样的努力叫做种族灭绝呢?结果是,由于这一点,甚至马祖拉尼奇也成了主张种族灭绝的反动分子,因为他不允许使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化”或者“匈牙利化”和“德意志化”。

克雷蒂奇在论文中说,在 1848—1849 年革命之后,克罗地亚的全部政治转向克罗地亚的一体化,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当他说,这是“同伊利里亚运动背道而驰的”,而这个运动是克罗地亚的复兴运动,他这么说就不对了。在这里值得指出,克雷蒂奇把克罗地亚谋求一体化的政治称做大克罗地亚政治,这势必同塞尔维亚和大塞尔维亚的政治发生冲突。

为什么把这样一种政策看成是消极的政策?这无非是要求所有的居民把他们自己看成是克罗地亚国家的公民,不论宗教或者种族的差异如何。换言之,克罗地亚领土的主权应当属于克罗地亚民族,它不可能与它境外的任何人分享。坚持这一原则就是反对在时机到来时通过匈牙利、威尼斯、德国,自然还有塞尔维亚的侵犯来削弱主权的做法。克雷蒂奇没有看到克罗地亚的政策和克罗地亚议会,事实上是在满足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的要求,以便在他们与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一起同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作斗争时能把他们争取过来。

克罗地亚的政治发现自己要把克罗地亚三位一体的王国(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的土地统一起来。当斯拉沃尼亚被完全并入巴昂统治下的克罗地亚联盟时,他还有待于完成它同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的统一和解放外国人占据的土地。说到这里,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上遇到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冲突的核心所在。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指出某些事实。亚伊策和比哈奇曾经属于克罗地亚王国。一直通到弗尔巴斯河的整个地区甚至在克罗地亚议会 1527 年认定哈布斯堡王朝为克罗地亚统治者之前,都曾是克罗地亚的一部分。从 19 世纪起,甚至在塞尔维亚的地图上,这个地区也被叫做“土属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上对塞尔维亚实行的政治,除了想把这一地区并入克罗地亚之外,还始终承

认有必要在这个地区的解放问题上联合作出努力。

克雷斯特奇对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与奥地利和奥匈的关系的考虑太过于简单。他声称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相反，亲奥地利占主导地位，并“把全部政治放在同奥地利合作上”。这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不正确的。事实恰恰相反。克罗地亚的全部政治都是追求完全脱离维也纳而自治，但是，它不得不面对现实，即哈布斯堡王朝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强国。

克雷斯特奇在解释 1902 年发生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冲突加剧时，没有看到这种紧张局势的升级的起因在于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文学信使》刊登了上述那篇《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文章，文章公开预言要发生较量，“直到我们被消灭，或者你们被消灭”，而萨格勒布的《塞尔维亚之盾》则在克罗地亚首都放肆地翻印了公开宣布对克罗地亚人实行种族灭绝的纲领。

克雷斯特奇根据他对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冲突所持的片面态度，得出结论认为，消除这场冲突的前提已经开始出现，因为“先进的克罗地亚青年和克罗地亚中产阶级的进步阶层”已开始放弃以历史权利和政治权利为基础的克罗地亚政治的“传统道路”。然而，克雷斯特奇有关冲突根源的历史看法背后的逻辑本身，特别是整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情况刚好相反。这就是说，对南斯拉夫实行一体化的幻想感到欣喜若狂的“进步阶层”人数甚少，而且当他们与未被放弃的大塞尔维亚思想对峙时就清醒过来了。不信任感更强烈了，两个民族—国家实体之间的冲突加深了。克雷斯特奇说，1914 年已经完成了一个纲领，“根据这个纲领，将十分激烈地对付塞尔维亚人”，并且“在 1914 年”要对“他们实行屠杀”。克雷斯特奇没有问一问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发生种族灭绝性罪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发生种族灭绝行为实际上完全在于克罗地亚一方，这一事实难道

没有意义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生的事情的责任主要在于内战局面，其标志首先是谋杀斯捷潘·拉迪奇，随后是谋杀亚历山大国王，而在战时则是乌斯塔沙分子以及塞尔维亚人和切特尼克分子在那场战争的总的环境下采取的行动，这难道没有意义吗？

克雷斯蒂奇的理论建立在纯粹的真空中，好像塞尔维亚人中间就没有反对克罗地亚人的种族灭绝思想，更不用说种族灭绝行为了。这一理论是与历史的真相相对立的，历史的真相表明，种族灭绝的思想来源于武克·卡拉季奇对克罗地亚属性的否定，而塞尔维亚的种族灭绝思想比权利党或者弗兰克党人^①走得还要远。难以理解的是，克雷斯蒂奇为什么没有看到，当他断言，种族灭绝罪行“不只是一种制度、一个党或另一个党、一个社会或另一个社会、一个个人或另一个个人的产物，而是漫长时期各种情况汇合的产物”，他的结论性的话不仅适用于克罗地亚人，也适用于塞尔维亚人。当他说：“种族灭绝的思想深深扎根于许多代人的意识中”，他大概是对的；但是，当他把这只归咎于“克罗地亚社会的某些中心”，他就完全错了。如果他认为他把克罗地亚属性称之为种族灭绝性，又试图掩盖塞尔维亚人方面的种族灭绝思想，而又认为他没有在为种族灭绝提供新的煽动，他就更加错误了。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关系中的种族灭绝现象问题上，如此片面的看法居然有权存在于塞尔维亚最高学术机构的中心——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中。有意思的是这个机构

① “弗兰克党人”指以约西普·弗兰克(1844—1911)为领袖的克罗地亚纯粹权利党成员，该党不主张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友好相处。弗兰克死后，安特·斯塔尔切维奇继任为该党领袖，1918年该党解散。——译者

成立了种族灭绝调查委员会,这可能是一个迹象,表明对阐明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积极的态度。但是,直到今天为止,除了它的成员参与赞同对亚塞诺瓦茨集中营情况的歪曲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结果。

在萨格勒布对安德烈·阿尔图科维奇审讯之后,该委员会仔细研究了由他们负责观察这一诉讼的米兰·布拉伊奇写的报告。报告作了批判性回顾,提出“为什么阿尔图科维奇没有因种族灭绝行为受到审判”以及法庭为什么不确定遇难者的“地点和人数”,还批判了阿尔图科维奇在最后讲话中向克罗地亚人民说的那一番话。有迹象表明,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从学术角度,而是从政治角度处理的。由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委员会主席弗·德迪耶尔(他还是罗素法庭庭长)来代表这样的“学术界”,可能使问题更加变得一团糟。罗素法庭一度是反对当代世界的罪行的一种政治抗议形式。不仅从德迪耶尔的书中,而且从他的言论中,特别是关于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的言论中,可以轻易地弄清楚他对种族灭绝所持态度的目的。

第一,德迪耶尔强调“南斯拉夫最大的不幸是每一个共和国和每一个省对瓦尔德海姆博士都有自己的立场”。“出于局部的利益”,南斯拉夫所谓隐瞒了有关瓦尔德海姆的真相,因为有关瓦尔德海姆所在部队参与种族灭绝活动的主要档案“要到克罗地亚去找”。他声称,“以安德烈·赫布朗和斯特沃·克拉亚契奇为首的克罗地亚的一些官员认为没有必要保存这些档案。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遗迹应予毁掉,这也是他们的观点”。德迪耶尔徒劳地为他的《梵蒂冈和亚塞诺瓦茨》一书搜寻原始文件,因为“乌斯塔沙分子的一大批档案被毁了”,他以此来支持他的发现。

德迪耶夫对共产党政权的结构太熟悉了,他不至于看不到

这样一点：赫布兰 1944 年被撤去克罗地亚共产党首脑一职，而到贝尔格莱德去负责经济部门之后，在战后不久的年月中，他已无法在克罗地亚作出政治决定。但是，德迪耶尔认为，对于所谓的毁掉档案材料和亚塞诺瓦茨集中营遗迹，赫布朗与克拉亚契奇应负有责任。如果德迪耶尔不了解，在战后最初的日子里，亚塞诺瓦茨和旧格拉迪什卡地区还被社会主义新政权用作一个营地，那么他肯定不可能不了解，或者不可能否认档案材料存在的事实是跟他所说相反的。

这也就是说，战后，克罗地亚独立国的主要档案文献被运往贝尔格莱德了。比较敏感的那部分党的记录没有交给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档案馆，这些记录的命运仍然不为人所知。为此，在工人运动史研究所建立后，我采取了措施至少从联邦档案机构得到复制件。我获悉，斯洛文尼亚人不允许拿走党的任何文件或者“敌人”的任何文件。需要弄清楚的是，是谁作出决定，把这些材料运到了贝尔格莱德（当时，莫沙·皮雅德^①处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属于主管党组织和内政事务的兰科维奇的职权范围）。这些文件的命运或许与其他一些文件的命运相同，后者在共产党情报局 1948 年的决议后有苏联入侵危险时从贝尔格莱德撤走了。

确实可以指控克罗地亚是主张实行共和联邦制的首要罪责一方。这里唯一的历史争论可能是，不承认各个民族共和国，恢复和复活一个南斯拉夫是否有可能。然而，对于制造对亚塞诺

^① 莫沙·皮雅德（旧译皮雅杰，1890—1957），记者、画家，前南斯拉夫党和国家领导人。1921 年即为南共执委，1940 年起进入南共中央政治局，1954 年起任联邦国民议会主席，直至去世。——译者

瓦茨集中营的歪曲和种族灭绝理论的人来说,这是完全没有争议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比特尔齐奇和德迪耶尔更为严肃和更讲方法的考虑中,也可找到这样的推测。

1986年的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备忘录争辩说,塞尔维亚民族“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接连有两代人两次面对肉体消灭、强迫同化、宗教改宗、文化上的种族灭绝——意识形态灌输,被贬损和在强加的有罪感下被迫放弃自己的传统,并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被解除武装”。除了克罗地亚独立国时期之外,“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过去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威胁”。正因为如此,“无法接受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历史罪中对称存在这样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看法”。

只有在以下前提下,这样的看法才有可能存在:要么完全无视历史事实,不愿去理解这些事实,要么是坚持认为,一切形式的克罗地亚属性都可予制服。

当历史事件的一幅歪曲的图景要求带上伪科学的光环,甚至以文学的充满激情的愤怒表现出来时,应当尝试算清历史的账目。正如武克·德拉什科维奇在他致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最高机构的《呼吁书》中向塞尔维亚民族说的那样,每一个民族“知道它受凌辱和它的容忍的最后的限度的!”这一《呼吁书》还说:“重伤要用烈药。公开的苦恼要求公开的对话。”^①

我致力于进行公开的讨论,以便论述某些事实,纠正危险的谬误,即便在法庭面前也罢。但是代替对话的是,所谓种族灭绝这个魔鬼变得越来越危险。

① 德拉什科维奇致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政治机构的信写于1985年12月16日。我处保存有向全国散发的这封信的复印件。